



■郑国韶乐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王石、马云？

——重提上海多“白领”、少“首领”之问

◎郑韶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一方水土养育的人群，上海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上海作为日趋国际化的大都市而多“白领”、少“首领”的话题，近日重又受到关注，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早在五六年前，沪上的舆论和媒体即已讨论过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来龙去脉。而今重提，不知是时光前行迟慢呢，还是物是人非而旧为新？

所谓白领，指企业事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而白领，泛指创业领袖人物和企业家。说实话，上海人的确喜做高管，善做高管，而不乐于、不善于做首脑。回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屹立不倒的企业、创业首脑能几人？在全国知名能与张瑞敏、王石等比肩者一个都没有。而服务于中外大企业的白领，从研发、营销、人事等类中高层管理人员到副董、副总乃至总经理的上海高管则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十万计。这里确实存在问题。

问题之一，上海人比较缺乏艰苦奋斗和大胆创新精神，比较缺乏阳刚壮烈情怀。这有可能使族群生命力弱；问题之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原始动力和竞争力被弱化。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活跃的关键因素，如果善于创造的人、高知识、高智商的人都去做听人指挥的、为人管家

管，奉令惟谨而已，亦无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荣光也自责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贪吏逞雄。”究其原因种种，或许是上海僻处海隅，水土丰沃，太平天国之前从无天灾兵祸，只要勤勉，即可过温饱生活，因而无所他求、不想冒险他就。李鸿章建轮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筹办，两人不愿带头掏钱投资，说穿了不敢冒险做“现代航运”，两年过去，一事无成。结果找到广东富商徐润、唐廷枢，两人说干就干，不仅投入自己全部家当，而且动员族人、亲朋共同投资，奋斗数年，终臻于成。结果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民族航运企业存续至今。每读至此，不胜唏嘘。

翻开上海史，名闻海内的大上海大亨特别是实业、金融巨头名流，基本上都是外来的冒险家，或外省（江、浙、粤、闽、皖居多）或外国，而本地名人除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不入清流者外，只能找到黄炎培等寥寥几人。知名的买办、精明的总办、襄理、协理则比比皆是上海人，而中高级职员更是以本地人和外来移民的后代为主力。他们在国中之国的十里洋场里，纵有委屈怨恨，也终“奉令惟谨而已”。如果说这种消极状态也有正面效应，那就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为1949年后新中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事务提供了一定的人才、经验、规则方面的储备。也就是说，滋生了买办文化土壤的管家人文、管理文化、管理人才和知识，无意间成为新中国的管理文化财富了。

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上海人不善冒险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并具体转化为上海的精良工业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以及严整的经济规章等等，为上海人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

■困学集

经济学家眼中的劳动合同期限选择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希望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选择，而另一些人则更愿意找到一家还算满意的单位，作为一辈子的就业场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劳动合同期限选择上的差异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原因可列出以下几个：

第一个原因来自人们固有的偏好特征。根据经济学的研究，人们一般都是厌恶风险的，比如要在一张10元钞票和一张有可能获得100元的彩票之间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10元钞票，这就是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对确定性收益的偏好就是厌恶风险的体现。在就业方面，风险厌恶体现在追求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短期合同让人有不安定感，潜在的工作变动可能让自己的未来变好，但也可能变坏。与其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还不如在目前的岗位上将就着。通常来讲，年轻人在就业选择上的风险厌恶程度相对低些，所以更偏好短期合同。

第二个原因来自雇员自身的人力资本。如果某雇员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比如过去的车、磨、刨、洗等岗位的八级工，供给较少，需求却很大，就会成为劳动市场上的稀缺者。他们签订长期合同或者终身雇佣合

同，前者支付给员工的实际收益更多，这个多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租金。换句话说，大型国有垄断企业的雇员能够得到高收入，并不是因为雇员工作能力更强，或者更努力工作，而仅仅因为处于一个垄断行业当中。所以，通常在具有丰厚租金的组织中，雇员更希望获得长期劳动合同或者终身雇佣，比如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的雇员就是如此。

第五个原因是转换工作的成本。转换工作不仅需要雇员重新加入到劳动市场的竞争当中，搜集各种就业信息，搜寻各类发展机会；而且还要和雇主重新谈判，并且即使获得了一份新工作，也需要重新适应新环境、新同事以及新岗位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巨大体力和财力。经济学家把这些称为劳动市场上的工作“转换成本”。显然，转换成本越低，换工作的动力就越大；反之亦然。在劳动市场不发达，还存在诸多劳动市场管制的情况下，这种转换成本也会很高，相应地，这些市场上的劳动者转换工作的意愿就不强烈，也就越渴望长期劳动合同。一般来说，年轻人转换成本低，越容易跳槽；而中老年人正好相反。

第六个原因是社会经济环境。如果某个岗位相对于其他岗位来说，具有某种特殊的租金，那么雇员就愿意离开，而且希望能够一直待在该组织中，享受这份租金。同样的职位，在一个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和一个处于高度竞争环境的企业，待遇却不

■金银岛

通胀势头之源：“农民红利”濒临枯竭

◎倪金节
财经评论员，专栏作者

最新统计数据 displays，2007年12月CPI增速为6.5%，全年高达4.8%，涨幅比2006年高3.3个百分点。如果说在几年前，当《华尔街日报》警示中国将进入通胀之际，国人还难以接受的话，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正视通胀势头对每个人现实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国际货币环境将再次宽松，全球通胀势必将会出现，我们不能再继续拘泥于“头痛医头”式的治理思路了，得从源头上设法根治。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通胀趋势的根源在于持续数年的宽松货币环境以及巨额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泛滥的货币供给成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凶。的确，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从来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始于2003年的本轮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现象很是严重。

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高达16.8%，增幅为1997年进入通货紧缩后的最高，坚持了10多年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果初显的迹象，泛滥的流动性似乎带来了总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不能不注意到，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倾向并没有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费零售总额的高增长更多的源于股市的红火，“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至为关键，而且央行的最新数据也显示，去年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亿元，比2006年多增4599亿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减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荡所淹没，可见目前的消费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因此，笔者以为，弗里德曼的命题在中国不能成立，中国的通胀趋势主要不是货币过剩引起的，过剩的流动性是造就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其实，中国通胀势头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人口红利也已经被过度消耗，濒临枯竭的边缘。

■排沙简金

楼市股市锻造了国人新财富意识

◎王育琨
(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当家做主，人人是股东，可是中国人没有体会到财富对个人生活的意义。当时，财富主要是掌控在代表人民的国家手中。改革开放以来，多少次的思想解放，多少次的新思维运动，多少年的高速增长，可是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多数人的财富意识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财富在那时时候，是和特殊人物、特殊权利、特殊路径、特殊心肠相联系的。因为富裕起来的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还是对财富很隔膜。

一般心底厚道的善良人，靠工资吃饭，靠种地吃饭，基本就跟财富没有什么关系了。生活还是像以往那样在延续。那时国营企业与公务员最受人们推崇。因为那是官办的，最为安全和稳定。那时人们最讲稳定，哪怕是跨国公司，谁都不知道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可以在一个美国人露易丝·海写的《生命的重建》中找到影子。

比如，我很穷，但是我很富；有钱人是骗子，有钱人是贪官；我不想有钱，不想盛气凌人；我的父母很穷，我也会很穷；只有骗子才会有钱，我永远不要挣钱；千万不能告诉我我在银行里有多少钱；永远不要借给别人钱，也永远不要去借钱；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没有关系和能力；节省一分钱就是挣回一分钱；为“不测风云”而存钱；只有努力工作才会有钱……这些刻画当年一般美国人心态的财富意识，跟前些年一般中国人的心态何其相近！

可是，仅仅十多年，尤其是近两年，中国楼市和股市的突变，让这一切有了一个根本的改观。这两年不动产和股市价值倍增，促成了国家财富向居民手中的转化，居民财富意识跟着起了变化。物质决定精神。

1985年我国城镇住房20亿平方米，当时研究的住房商品化方案是，每平方米200元卖给个人。2007年，城镇住宅总量达110亿平方米。现在住房价格在所谓一线城市都达到了每平方米2万元，如果折中算，全国平均也达平方米5000至6000元。这样一来，住房资产总值便达到60万亿元左右。如果再把现有的250亿平方米小产权房纳入住房统一市场中的话，每平方米按1000元计，就是25万亿元的资产。与城镇居民住房资产相加，有了超过85万亿元的资产规模！

于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即先前在“单位”分到了房子，先前有点私房的，甚至没个活钱的农民，一改一无所有的局面，随着房价的节节上升而扬眉吐气起来。那些一辈子靠低

自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后，中国农村数亿廉价劳动力大量涌至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据人口普查资料，一年之内在城镇常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人口超过两个亿，加上短期流动到城里找机会的民工，保守估计也有3个亿。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了，这3亿民工相当于美国与欧洲劳动人口的总和。“三农”的逐渐城市化，已经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也出现了大量荒芜，年富力壮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男耕女织”，要是在过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粮”的情况下，很难设想会出现去年猪肉和粮食价格的如此暴涨。

自1999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减少，不能满足当年消费。比如，2003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为333公斤，仅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这几年在惠农政策的一再推动下，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2007更是超过5亿吨，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首个连续四年增产。

但是，就在国内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的当年，粮食与食品价格却出人意料地持续大幅度上涨，表明虽然粮食丰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增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

现在的现实是，虽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是地方政府却把农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地方官员总想着怎么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目前各地已有182个地方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占了总比例的82%，若是眼里心里都在一门心思想着建设大都市，何来心思改善农村福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呢？

可偏偏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农民红利逐渐消失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如若再不高度重视农民红利枯竭的问题，设法提高农民的务农收益，CPI或许将以“咆哮”的方式向国人警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要想防止更为严重的通胀，治本之策理应是改变农村目前的经济格局，将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彻底解决留守农村的农民多是“老弱残孤”的现状，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管制政策来平抑农产品价格。

工资生活的人们，到了退休有一套两套房子，猛然间也挤进百万富翁行列，让人不能想象。农民的身份更是特殊。先前的一个农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费用，现在全反过来了。城市人想转成农民户口，则至少要拿出30万元，还找不到门。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农民的宅基地升值了。

不能简单说房价上升就是泡沫、水分太多。中国住房资产的大幅增值，并不简单是地方政府卖地、开发商黑心、炒房团捣乱、政府调控不到位的作用。这实际上还暗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换，85万亿房产就是居民财富丰度的指示器。尽管城市居民对市场上的高房价有抱怨，但是住房价格一旦跌落，抱怨的声音恐怕会更强。因为房价跌落等于居民手中财富贬值。一如1997年后的香港，楼市大跌价，大多数居民由富翁变成了负翁。

股市也不甘落后。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市值从早些年区的千亿元，2006年初3万亿元，2007年一度摸高30万亿元，普通股民手中握有了真正的财富。无论是退休人员还是在职人员，无论是农民工还是无业人员，无论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没上几年学的人，甚至学生和乡下来的保姆，都纷纷加入到炒股大军。普通公民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个大牛市中得到了实现。

人们不再对谈钱谈钱莫如深。大家开始乐观起来，开始一切向钱看，开始出国旅游，开始进高级餐馆，开始说自己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新东西，开始说自己交了多少税等等。人们花钱时满怀喜悦和自豪。人们聚到一起，不再像以前那样，“你好”、“吃饭了吗”等问过以后就摆摆手道别，现在他们有了更多的话题。那种痴迷和热情，一下子使整个社会温暖了起来。

随之，一种新的财富意识渐渐“展开”：“我们自己消极的信念是惟一限制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贫穷是我们意识中的信念所导致”，“只有我自己才是那个对自己的贫穷负责的人”，“世界为每个人做了充足的准备”。

这种财富意识的悄然而深刻改变，还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种新的心态，把自己敞开来，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向我们流淌而来的财富和所有的好事。

中国人开始公开地、疯狂热情地追逐财富，同时他们又狂热追国学、崇尚并恪守着人类最普遍“诚信”、“勤劳”、“和平”、“仁爱”等基本价值。被冷落了太久的国学重又登上前台，于丹、易中天等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向善，人们开始触摸传统，触摸那些左右了中国人几千年的价值。同时，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小股东投资权益保障委员会等非政府机构（NGO）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我以为，这一切形成了中国繁荣昌盛的真正基础。